

分类号：  
UDC

密级：  
编号：

# 暨南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涉华报道研究

---

——基于《星洲日报》的内容分析

---

学位申请人： 翁 倩

导师姓名及职称： 董天策 教授

专业名称： 新闻学

2010 年 5 月 25 日

#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题名（中英对照）：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涉华报道研究  
——基于《星洲日报》的内容分析  
**A Study on News Coverage over China Issues  
in Malaysia Overseas Chinese Media  
——A Content Analysis on *Sinchew Daily***

作者姓名：翁倩

指导教师姓名 董天策

及学位、职称：博士、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新闻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0年4月

论文答辩日期：2010年6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论文评阅人：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暨南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翁倩 签字日期：2010年5月25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暨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暨南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翁倩

签字日期：2010年5月25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导师签名：董天策

签字日期：2010年5月27日

电话：

## 摘 要

本论文以东南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报刊《星洲日报》为个案，对其 2009 年包括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涉华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旨在讨论以《星洲日报》为代表的海外华文报刊，在报道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事件中的规律性特征，并从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剖析该规律性特征产生的原因，从而对我国的对外传播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本论文借助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法，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首先从宏观上总体把握《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议题框架，再深入文本，以“兽首事件”为例，对其报道框架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星洲日报》总体上构建了相对客观和中立的新闻观，“人情趣味框架”是其涉华报道的主要框架，在涉及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报道中，《星洲日报》较为倾向于中国。

文章最后建议，我国的对外传播，应继续加强经贸议题的报道，加强民生新闻的报道，将文化交流转变为真正的民生报道。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人权及政治事务的处理上，可努力的空间不大。

**关键词：**星洲日报、涉华报道、海外华文报刊

##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news coverage over China issues in overseas Chinese media, hence to reveal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national-image” in these media founded on their reporting features. *Sinchew Daily* of Malaysia was chosen a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our study.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ver the reporting features of *Sinchew Daily* when covering news about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part from revealing the reporting features of this medium, we tried to analyse the reason behind its unique pattern of news coverage over China-related news through different aspects, by applying the views of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By applying the framing theory and content analysis, we underwent a detai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acroscopically, we defined and classified the main content frames of China-related news reports occurred in *Sinchew Daily*. We then further our study microscopically by exploring the framework and structure in the reports concerning the “Paris auction of the bronze fountainheads stolen from Yuanmingyuan”.

From our study, it is shown that *Sinchew Daily*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unbiased point of view on China-related news report. Also, *Sinchew Daily*'s China-related coverage is driven by the preference of “Interesting event and humane customs” significantly. When coming across political and foreign affairs, *Sinchew Daily* is more preference towards China's official perspective.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should emphasize more in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civil development, instead of over-emphasizing on promoting ideology, which has limited effect in foreign mass media.

**Key words:** *Sinchew Daily*, Chinese news reports, overseas Chinese newspaper

## 目 录

中文摘要 .....	( I )
英文摘要 .....	( II )
目录.....	( III )
1. 绪 论 .....	( 1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1 )
1.2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与《星洲日报》历史回顾.....	( 2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4 )
2. 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探讨 .....	( 7 )
2.1 框架理论回顾.....	( 7 )
2.2 内容分析法.....	( 11 )
2.3 本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12 )
3. 《星洲日报》涉华议题框架分析 .....	( 15 )
3.1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总体构建 .....	( 15 )
3.2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新闻处理分析.....	( 23 )
4. 《星洲日报》报道框架分析 .....	( 26 )
4.1 框架的高层次分析.....	( 26 )
4.2 框架的中层次分析.....	( 28 )
4.3 框架的低层次分析.....	( 31 )
4.4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报道框架特征 .....	( 32 )
5. 结论和思考 .....	( 33 )
5.1 结论.....	( 33 )
5.2 思考.....	( 34 )
5.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36 )
注释 .....	( 37 )
参考文献 .....	( 40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43 )
后记 .....	( 44 )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方汉奇先生曾将海外华文媒体称为“未曾穷尽的研究课题”<sup>[1]</sup>，这其中又以华文报刊为最。海外华文报刊是世界传播大军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首先，中国近代华文报刊即肇始于海外，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考》是近代华文报刊的先驱，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开中国餐馆、兴中文学校、办华文报纸”是近代以来很多移居海外中国人的首要之事，“华侨社团、华文教育、华文报刊”也是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sup>[2]</sup>，在海外的很多地区，华文报刊比电台和电视台有着更为成熟的运作方式及强大吸引力，且这一影响力至今不曾改变。调查显示，在马来西亚600多万华侨华人中，每天阅读华文报刊的人数大约保持在230万至260万之间，华文媒体所涵盖的华人家庭则达到60%，华文报刊对华人影响甚大。<sup>[3]</sup>

第二，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海外华文媒体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华侨华人，它们的传播内容一般能够反映其所属华侨华人社群的思想、文化认同和政治烙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华人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日益加强，分布很广的海外华文传媒成为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合作来合理运用的资源，它们如何报道中国、为何如此报道中国是国际传播领域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答案对于处在崛起过程中，希望改善中国国家形象，促进海外华侨华人和中国联系的政府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涉华报道做一个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特选择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作为样本进行个案研究。华文近代报刊起步于东南亚，经过将近200年的发展，东南亚目前依然是海外华文报章最集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其中又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其中翘楚。暨南大学彭伟步先生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近年来，由于系统和完好的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已经逐渐取代新加坡成为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心。<sup>[4]</sup>华人占马来西亚人口的四分之一，华文媒体不仅是当地华人社会的重要信息媒介，也是东南亚华人沟通交流的媒介。在这些媒体中，《星洲日报》的影响最为显著，它历史悠久，发行量大，在其他语文报纸发行量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其发行量依然有所增长，“2007年12月底，该报的发行量上升至36万份，星期天的发行量更是增长到40万份。”<sup>[5]</sup>2008年4月30日，由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兼香港明报集团主席张晓卿掌控的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简称“世华媒体”）在吉隆坡股票市场上市。<sup>[6]</sup>“世华媒体”由星洲媒体集团、南洋报业集团、

香港明报集团合并组成，成为中国内地之外最大的华文媒体集团，开始迈入全球化的发展。

《星洲日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样本，它对中国的报道也是海外华文传媒涉华报道的一个窗口，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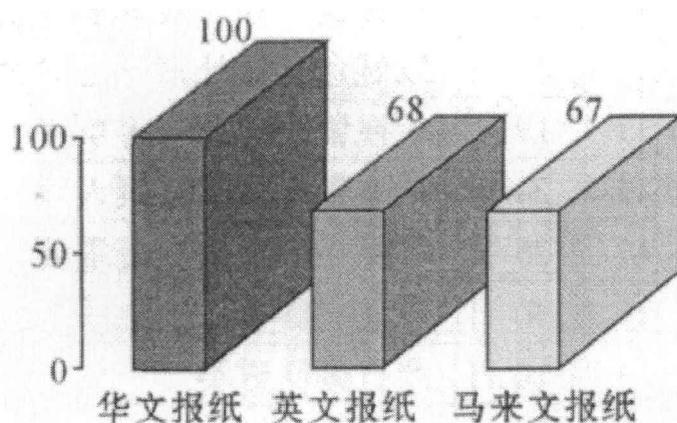
## 1.2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与《星洲日报》历史回顾

### 1.2.1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

1815年，世界第一份华文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今属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诞生。它冲破了清朝的言禁，打开了言论自由的大门，带给中国新的思想和风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进步。此后，新加坡相继创刊了一批报刊，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的信息交流。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东南亚华文报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即在此时创刊。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现已呈现出垄断化的趋势，三家最大的华文报总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都设于大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吉隆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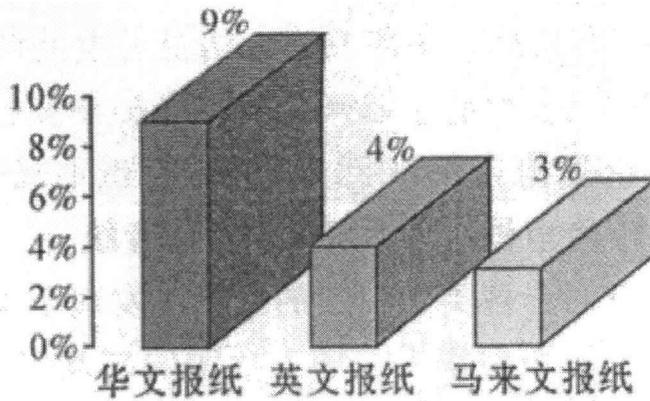
马来西亚早期的华文主流日报，主要由家族垄断与营运。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家族势力控制华报的现象日渐式微，代之而起报业的集团化。除《光华日报》外，其他报纸都置于大财团麾下，针锋相对、互争雄长。

马来西亚华文报有广大的销售市场，读者群众多，远超过马来文报和英文报的读者，居各语文报之首。调查显示，华文报读者人数逐年递增，在华人社会建立起巨大的公信力。（见图表一、图表二）



图表一：马来西亚发型审计局对境内日报发型的统计<sup>[7]</sup>

（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 单位：万份）



图表二：马来西亚各语文报纸发行量增长率<sup>[8]</sup>

(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日)

马来西亚报业在政府和执政党的控制下运行。政府要求所有新闻媒介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服务，致力于宣传国家思想指导思想，着重报道“社会重建计划”和社会积极的东西，回避消极因素和敏感问题。这便是马来西亚政府倡导的指导性新闻。为了更好地管理报纸和其他印刷物，政府与1971年重新修订了1948年殖民地政府制定的新闻出版法。从那时起，报纸想要出版发行下去，就必须每年向内政部申请执照。对于来自其他国家的华文报纸，马来西亚也用法律加以控制。

虽然华人报纸以提高商业利益为第一要务，但也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使命，大力支持大马华文教育的发展，并扮演起监督、鞭策和制衡华人社团的角色，还以报纸为社会公器，为华人社团发出正义的呼声，争取华人社团的合法权益。

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前景乐观。该国的华人人口很多，而且有完整的华文教育，倘若政府当局今后的教育政策没有倒行逆施，使华文教育变质，那么华文报的读者仍然居各国之首。读者多，销路广，华文报有利可图，前景一片光明。<sup>[9]</sup>

### 1.2.2 《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由胡文虎1929年1月15日独资创办。邓荔生任总经理，朱宝筠为主笔，每日出版四大张。创刊宣言即明确介绍和反映了胡文虎的办报思想：“提高国人知识，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舆论界司社会喉舌，负指导天职，地位多么庄严，责任多么重大”，“求民族、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力倡华侨投资祖国，籍定国基；提供各种教育，沟通中西文化，以增进华侨地位”，“环顾星洲，物质文明一方面虽稍发展，而精神文明则实多缺陷。故极应增进社会教育的效能，为之补救。如对于宗法社会之陋习，封建时代的思想，应根本改革。而于现时代的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美术，更应沟通传播，此其所负者

一，精神团结，则力量膨胀，故要求精神的团结，必使言论之集中。此其所负者二，建设伊始，实业交通，种种计划……我们的言论界应居于督促地位，俾其认真建设，此其所负者三。总观此三点，可明白创办本报之动机，完全是适应现时代与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创刊伊始，《星洲日报》便以“提高国人智识，补助学校教育之不足”为创刊宗旨，并信守不渝，在华文教育和华文传承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3年，在政府的旨意与策动下，新加坡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幸而檳城巨商林庆金收购了《星洲日报》与《星洲日报》，胡氏家族的命脉得以在马来西亚延续下来。

《星洲日报》历史上曾两度停刊，第一次是1942年至1945年，因日军前侵，新、马两地相继沦陷，被迫停刊；第二次是1987年早马来西亚政府援引出版和印刷法令吊销出版准证，即马来西亚华文报刊史上著名的“茅草行动”。当时《星洲日报》处于停刊关门的境地，张晓卿乘势买下报纸，通过自己与时任内政部长马哈蒂尔的私交，向内政部作出种种承诺，1988年4月28日《星洲日报》得以复刊。复刊后销量节节上升，目前已达48万份，每天有超过118万马来人阅读《星洲日报》。《星洲日报》不仅成为东南亚发行量最大高的华文报章，也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外最大的华文日报。该报还在柬埔寨、印尼等国创办了《星洲日报》分版。<sup>[10]</sup>

该报平均日出对开25张，周日出14张，内容主要有要闻、国内、国际、体育、综合、赛马、言路、财经、大柔佛、新新人类、娱乐、健康人生、家庭生活、一班男女、新教育、小说、妇女、菜式食品、医药与健康、青春、星云、文艺、佛学、广告及七个地方版。内容丰富，周日还有星期刊推出。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研究

海外华文媒体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对东南亚华文传媒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在新加坡，如王慷鼎和崔贵强。王慷鼎的专著《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sup>[11]</sup>系统分析了新加坡四大华文报纸的社论，研究了二战后15年华文日报社论对国际性、地区性及地方性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件等的反应和立场，为新马报刊史研究的首创。该书进行了大量统计，数据翔实，虽然其研究主要以社论为主，也受到年代的局限，但依然为后人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叶观仕的《马、新新闻史》1996年由吉隆坡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出版，厚达338页，回溯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报业

自 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情况，把新马报业的发展分为萌芽时期、成长时期、发展时期、沦陷时期、光复后初期、独立后至九十年代。由于跨越的时空过长过大，书中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但该书的 10 篇附录，其中的“马来西亚现有华文报概况表”、“新加坡现有报纸概况表”、“马、新已停刊的华文报”颇具参考价值。

崔贵强所著的《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是由 8 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sup>[12]</sup>，概述了新加坡华文报刊的历史概况；他的另一本专著《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则以国别分类，介绍了东南亚五国华文日报的发展。该书立足于描述性的叙述和概括，未能提出关于报道特点的研究结论。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影响较大的成果按时间顺序来看，主要有方积根、胡文英的《海外华人报刊的历史与现状》<sup>[13]</sup>、杨力的《海外华文报业研究》<sup>[14]</sup>、吴庆棠的《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sup>[15]</sup>、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sup>[16]</sup>、程曼丽的《海外华文传媒研究》<sup>[17]</sup>、彭伟步的《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sup>[18]</sup>及《海外华文传媒概论》<sup>[19]</sup>等。此外，王士谷还主编了《华人华侨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sup>[20]</sup>，该卷共有词条近 2900 个，释文 3200 余条，连同附录计 100 多万字，是该领域较为完备的工具书。

这些著作中，有将海外华文报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也有单独选择某一个国家的华文报进行研究的，例如《菲律宾华文报史稿》即记录了菲律宾华文报创刊以来 118 年的历史，是研究菲律宾华文报和华人历史的可靠读物和文献，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彭伟步《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一书则是第一部比较深入、系统、全面研究东南亚华文报纸与华人关系的著作，它在新闻史实的基础上，用新闻学、社会学等理论，深入分析了东南亚华文报纸成功发行和生存的经验，揭示了东南亚华文报纸与华人之间的鱼水关系。在该书的研究过程中，彭伟步结合使用田野调查法，深入东南亚实地，探查当地华人华社社情民意，考察各国华文报业生态环境，访问华文报业界从业人员以及学界研究人员，收集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2008 年，彭伟步出版《〈星洲日报〉研究》，是第一本以《星洲日报》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本文的研究多处得益于彭伟步先生研究成果的启发以及研究资料的帮助。

印尼华文报刊是东南亚华文报刊研究的重点<sup>[21]</sup>。何耕新认为，印度尼西亚华文报业有过辉煌的悠久历史，也经历过漫长的黑暗岁月，如今又重临曙光，但步履维艰地复苏。目前印尼华文报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出版，但过多过滥，与当前印尼华文读者群狭小的现实脱节，面临报份少、收入少、人才少的三大难题。<sup>[22]</sup>袁丁认为，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也需要有不断扩大的读者群，特别是年轻的华

裔读者群。<sup>[23]</sup>黄昆章认为,目前印尼华文报刊具有以下特点:1. 华文刊物几乎都在外国注册;2. 以立足印尼、促进印尼民族团结为宗旨;3. 报纸多为日报;4. 报刊文章犀利;5. 一些报刊注意报道和宣传中下层华人生活的动态和图片;6. 弘扬中华文化;7. 大多数华文报刊采用繁体字。<sup>[24]</sup>

此外,该领域数量可观的专题研究论文也时常可见。本世纪以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闻社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开展一次,共同探讨经济全球化及文化多元化两大趋势下海外华文传媒如何应对,跨文化传播等诸多论题。中国新闻社还编辑出版了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为深入研究海外华文媒体奠定了基础。

### 1.3.2 现有研究的不足

#### 1. 对东南亚媒体研究不足

学术界关于涉华报道的研究绝大多数基于西方媒体,其他区域媒体则研究不足。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持续成为研究热点,研究多为个案分析。例如吴玉珍运用樊·迪克等人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对《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新闻进行了定性分析;翟峥以1998年《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美关系的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总结中美两国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其他国家媒体的涉华报道,则以碎片形式呈现,散见于各篇论文中。东南亚媒体中,《联合早报》较受研究者关注,其他媒体的研究相对不足。

#### 2. 研究方法上存在不足

国际传播及国际关系研究者以海外华文传媒作为研究对象并不鲜见,但多数是描述性的介绍和简析,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媒体特点的描述大多基于感性,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多学科思维的综合研究数量均有限。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虽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分析较为到位,但基础的统计却不够扎实,使得后面的分析失去了应有的信度。

## 2. 理论回顾与研究方法探讨

本论文对《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研究思路为：假设媒体进行报道时，会自动启动“框架”，固定呈现某一类事件，或固定呈现事件的某一部分而忽略其他部分。因此选择对《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总体和新闻事件个案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在研究涉华报道的文本内容的基础上，探讨海外媒体涉华报道的总体特征。所涉及的主要理论为框架理论，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

### 2.1 框架理论回顾

#### 2.1.1 框架理论背景：客观现实、媒介现实、主观现实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曾说：“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频繁变化和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sup>[25]</sup>

媒体在这种重构活动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人们形成“脑中图画”的重要工具，是客观现实之于主观现实的桥梁。伯格(Berger)与拉克曼(Luckman)在1967年合著出版的《现实之社会建构》一书中，将社会现实分为“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媒介现实”(media reality)和“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三个层面。<sup>[26]</sup>传统社会中，社会交往的空间较为狭小，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基于“第一手信息”的掌握，当时的“主观现实”尚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存在；近代之后，随着工业革命及19世纪以后“交往革命”的发生，人们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随着大众传播系统的逐渐普及，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分离，成为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楔入了人与客观环境之间。然而，“现实”无法完全“复制”于媒体，在选择和重组的过程中，媒介会“挑选”和“排除”，然后再互动和组合，最后产生框架。

由此可见，框架理论的提出，有两个理论前提：首先，媒介反映现实的方式非镜像式的完整复现；其次，“现实”是由媒介构建的。媒介是社会现实的“定义者”。在现代传媒业异常发达的今天，我们时常在客观现实、媒介现实和主观现实之间穿梭。

#### 2.1.2 建构主义

“媒介建构论”是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的重要论点。麦奎尔(MeQuail)认为，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魔弹论”、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有限效果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宏观效果理论”、以及始于80年代，至今仍占主流的“社会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认为，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不能充分解释这个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而建构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崭新视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力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被译到中国之后，国内学界掀起了建构主义研究的热潮。

建构主义集中研究媒介讯息塑造过程中的内在规律，而非之前可量化的媒介接触及态度行为的变化。它的研究重点在于如何将各种符号、意义、政治议题及文化因素通过遣词造句、选题、编辑方针等组合方式构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主义不仅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受众如何接收和处理媒介信息，而是先肯定讯息制造过程的灵活性，观察媒介内容的具体变化，并将此变化放到全社会、整个媒介市场的宏观环境中进行全面考量。<sup>[27]</sup>

综上所述，既然已知媒介现实是客观现实通往主观现实的桥梁，媒体能够建构事实，那么，媒体如何构建和传递客观事实就显得特别重要。“框架理论”这一种“定义真实”的理论便在追问中产生。

### 2.1.3 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framing)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它并非源自传播学研究，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心理学和社会学。<sup>[28]</sup>一般认为，框架理论首先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的思想。贝特森认为：“心理框架是一组讯息或具有意义的行动”。<sup>[29]</sup>戈夫曼将其引入文化社会学领域。在该领域中，戈夫曼属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拟剧理论”——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而他的全部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基本观点为前提的。1974年，他出版了《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一篇论文》一书，其中讨论了外在客观世界在人们心中的状况。书中，戈夫曼首次对框架及其概念进行了详细描述。他认为框架是“约束着我们主观参与的事件的组织原则。”他假设个体无法全面认识世界，为了了解世界，人们总是努力解释自己的生活经验。“社会事件本就散布各处，彼此无所归属，须通过符号转化，始能成为与个人内在心理有所联系的主观认知。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框架的基础。”<sup>[30]</sup>按照戈夫曼的观点，人们的经验不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重构，人们借由框架把社会真实存在转化为主观的认知，整合并处理信息，从而做出判断和反应。

心理学领域的“框架构建”概念来自于心理学家凯尼曼(Kahneman)和特威基(Tversky)

的决策研究。1979年他们在心理实验中发现,本质相同而叙述不同的决策方案会影响人们对决策方案的认知,从而导致不同的选择。当决策方案被叙述为一种“获得”时,人们偏爱回避风险;而当决策方案被叙述为一种“失去”时,人们更愿意冒险,认知心理学将之命名为框架效应。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已经初步发现在风险决策中人们处理感觉、知觉和情感信息时,皮层、边缘系统以及广泛的神经调节系统会起到中介调节作用,信息的表述不同有可能通过激活决策者大脑不同的神经部位来对信息进行处理,从而让决策者做出不同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由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学术传统酝酿的“框架”理论很快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

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在其著作《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中,第一次将框架的概念运用到大众媒介和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框架”的定义众说纷纭,美国传播学者斯蒂芬·李斯(Stephen Reese)认为“框架是一个社会共享的、时间上显得稳定的、可用来以象征手段将社会世界有意义地结构化的组织原则”。甘姆森(William Gamson)将“框架”定义为一个话语单元的“核心组织观念或故事脉络”,不仅使事件具有意义,而且可以从中推导出处理事件的对策。政治学家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Entman)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指出“框架”的重要作用在于“选择感知到的现实之某部分,将它们凸显在传播的文本当中,以此倡导关于被描述现象的某种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义评估,以及处理方法”。

对于框架的定义,比较受到认可的是吉特林的说法。他在《全世界在观看》一书中指出,“使得超越我们直接经验的世界貌似自然的是传媒框架……框架就是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的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与戈夫曼相同的是,吉特林也认为框架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无意接受的。

恩特曼的看法与上述稍有不同。他认为框架是通过强调某种定义,某种因果解释,某种道德批判,以及(或者)推荐某种解决办法以选择和凸显事物的某些方面。<sup>[31]</sup>框架不是人们被动接受的,而是主动选择的。他认为传播学视野之下的框架是一个“分散的概念”,框架分析是一个“破碎的范式”。<sup>[32]</sup>安杰罗认为,框架就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重组事实。<sup>[33]</sup>

当代美国学者 Gamson 是框架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者,他认为框架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可引申为对社会事件的规范;另一类则指人们用以诠释社会现象的“架构”,用以解释、转述或评议外在世界的活动。后来,其他学者后又指出,框架既有

协助人们思考或整理信息的正面意义，又可能成为人们意识形态或刻板印象的主要来源，“框限”了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具有负面效果。

虽然观点有所分歧，但“框架”是一种对于意义的建构过程早已达成共识，它暗含了对信息进行选择和重组的步骤，使意义在传播过程中重新建构而变得有序。“框架”本身也作为对一类问题的规范处理的标准固定下来，并且继续作用于变化的现实。从直观效果层面上说，“框架”体现于所生产出的文本，文本中的某些特定信息在框架的作用下被突出，并和大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概念相联系，从而引导了受众对该事件的阐释、评价以及采取的反应。正如吉特林所说，新闻框架这些心照不宣的理论构成了媒介。

本研究主要根据不同的框架层次对文本进行分析。按照台湾学者臧国仁的观点，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框架的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以及低层次结构。

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是指对于新闻主题的界定，即“这是什么事”具体到新闻文本中，高层次结构通常会通过标题、导语、直接引语的形式表现出来。框架的中层次结构一般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溯因、评价等。其中，“主要事件”是指故事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主要人物、情节、动作等。“先前事件”与“历史”是指主要事件发生之前并且有直接因果关系者(先前事件)，或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但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者(历史)，即新闻写作中的新闻背景。“结果”与“影响”是主要事件引起的后果，包括直接(结果)与间接(影响)的效应。“溯因”与“评价”指对事件发生的因果推论及对事件现象的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而框架的低层次结构则指字、词、修辞等具体的语言符号的使用等。<sup>[34]</sup>

#### 2.1.4 常规下的框架

“常规理论”是新闻社会学中的重要理论框架。对于常规状态下的新闻实践来说，保持中立、以客观的方式报道新闻、反映观点，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和操守，相比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等对新闻框架的影响，新闻生产的基本仪式，构成了日常新闻框架中具体可感的因素。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新闻媒体必须采取己为经验证明、成为常识的、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采取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使整个新闻生产流程顺利完成且富有效率。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完成好工作，他会沿用一定的模式或惯例，比如在选材上，选择读者感兴趣的内容；采访时，寻找最接近信息源的人；写作上，依照“倒金字塔”的结构等等，“新闻常规”和新闻专业主义互为因果，“新闻常规”也是保持

新闻专业主义的直观表现和重要手段。

### 1. 新闻价值：入选框架的标准

新闻价值是新闻取舍的关键标准，影响着一些新闻被凸显还是被淡化。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指导新闻报道写作的教材中对新闻价值有着更为详细说明：在“相关性”、“有用性”和“趣味性”这些判断新闻价值的总原则之内，“新闻工作者们在每个潜在的新闻报道中寻求更为明确的元素”，包括“影响力、冲突性、新奇性、显赫性、接近性、时效性”等。此外，随着传统的受众转化为“媒体消费者”，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也要随着受众的需求而改进。<sup>[35]</sup>此外，框架研究者们则提出，在新闻生产中，妥协和协商对于新闻价值评估具有重要作用。

### 2. 消息来源：第一建构者

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框架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新闻源开始，框架就始终存在着。报社和通讯社就是一张生产新闻的网，这个“网”是一种框架，它在确定哪些事实成为新闻的同时，也就把其他的事实排除在外。此外，不管是在采访区，还是事发现场，记者们往往会与同行共享信息（但是对于一些真正的独家新闻记者是不会与他人分享的）。记者还可以娴熟地根据新闻内容比如火灾、车祸、会议等等，很快确定去哪里找信息源，从什么角度报道，采访什么人等。因此，由于新闻工作者获取新闻源时的一些常规性做法，决定了一部分事实被选入框架内，从而将其他事实排除在框架外。

### 3. 新闻文本：重新建构的方式

新闻文本是常规框架下的特殊产物。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水准、新闻报道的操作流程等对新闻文本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为方便、清楚地报道新闻事件，5 W1H 成为熟知的要求，开头、过程和结尾的逻辑顺序成为讲述的结构，每个逻辑结构中插入适当的消息来源作为依据。这一文本建构的方式可以视为存在于文本中的框架，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闻报道对于完整性的追求。此外，有学者发现，新闻人员常以四个策略来表现“客观”，即“正反并陈、提出论据、倒金字塔写作、使用引号”。把新闻文本作为对象进行话语层面的解读，荷兰学者梵·迪克(Van Dijk)的研究最为著名，他的新闻图示成为众多研究者进行话语分析的范式。

## 2.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以信息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学者贝雷尔森是最早为内容分析法下定义的学者，他认为内容分析法。可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

统、定量的描述, 并具备以下特性<sup>[36]</sup> :

1. 客观性: 客观即指对分析的类目加以明确的定义, 使不同的研究者在进行分析归纳时能够摒除成见, 得到相当一致的结果。内容分析法借由客观定义来保证研究的信度, 使研究不因研究人员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
2. 系统性: 类目的建立、内容的取舍, 必须符合始终一致的规则, 类目的建立应视研究问题而定, 研究者应尽量排除依据主观认识建构类目的可能。
3. 定量性: 内容分析要依照规则, 对拟定类目的分析单位加以计量, 通过数字来量化“符号”和“特定文字”出现的次数, 已达到结果准确的要求。

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 西方研究者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一般而言, 内容分析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传播者、传播内容和受众。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 如《市场分析》<sup>[37]</sup>、《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sup>[38]</sup>、《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sup>[39]</sup>、《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sup>[40]</sup>。

## 2.3 本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选取《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历时一年的研究, 对其报道的总体与新闻事件个案进行文本及内容分析研究, 探讨《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总体特征及报道模式、从而考察《星洲日报》构造中国形象的倾向性, 并从海外华文媒体自身、我国对外传播角度以及对国内新闻报道的角度, 提出改进建议。

### 2. 样本采集及类目构建

本研究的样本——《星洲日报》是马来西亚第一大华文报, 由南洋著名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于 1929 年 1 月 15 日创办, 后形成著名的星系报业。经过几次停办几次复刊的沧桑巨变, 1988 年复刊起, 《星洲日报》便不断刷新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历史, 成长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1992 年, 《星洲日报》发行量超越《南洋商报》, 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报。经过 80 余年的发展, 除了在马来西亚扩大销量增强影响力外, 《星洲日报》还把视野放在东南亚, 理智地为东南亚华人提供更详尽更准确的资讯。它不仅创造了中国及海外华文新闻报业史上有名的星系报业奇迹, 还发展成为发行量超过 30 万、读者超过 130 万人的南洋第一大华文报, 甚至是除了中国之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可以说, 《星洲日报》是在远离中国大陆、面对文化压制和民族受阻碍的空间下发展起来的报纸, 是海外

华文报刊的一个典型代表，其通过新闻报道反映出来的中国形象，不仅代表着海外华文报刊的取向，代表着一种站在异文化的角度上对自身文化归属的寻找，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马来西亚主流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

本研究的时段限定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数据采集的具体方法是，每月随机抽取从周一到周日的七天，文本以立意抽样（即调查者的主观选择）的方法获得，娱乐新闻排除于本研究文本之外。因为首先《星洲日报》作为华文报纸，关注的娱乐话题较多的集中在华人娱乐圈，以国别来分而论之意义不大，第二，作为一份市场化报纸，八卦报道、明星追踪对于构建国家形象，作用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条件所限，编码员仅为笔者一人，因此信度问题由笔者在前后间隔一段时间后自我检测完成。

本文在内容分析部分，制定的类目包括：1.报道总量、2.议题内容、3.议题走向、4.新闻稿源、5.报道倾向性。

(1) 报道总量：2009年《星洲日报》涉华报道总量及每月抽样总量。

(2) 报道内容：本论文研究的是广义的“大中华”地区，因此文本选择包括了两岸三地的有关新闻。报道内容主要按照新闻报道的类型进行划分，如果某条新闻涉及了两类或以上不同内容，则依据事件的主要性质加以归类。

(3) 新闻稿件来源：根据新闻引用的实际，分为本报综合、大陆媒体、西方媒体、港台媒体、本报讯、未知及其他（互联网等）。

(4) 报道体裁：本研究将新闻体裁分为新闻、评论、图片报道三类。

(5) 报道倾向性：即报道的叙述、语气、评论的倾向。具体分为：

正面：指报道内容有利于中国的形象，包括赞美、肯定、行动呼吁等；

中性：指报道的论述语气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正负倾向或夹杂着正面、负面等一种以上不同语气，显示出报道立场比较中立；

负面：包括恐惧、歧视、罪恶、丑化等。

本研究使用软件SPSS13.0来分析样本数据。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所有的分析和归纳，都建立在大量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上。为了尽量达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内容研究法力求使研究结果真实、客观、准确；框架分析法基于框架理论，是近年来媒体报道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

对于研究样本，本文采取整体和个案两种方向维度进行分析，“议题框架”讨论《星

洲日报》将哪些议题纳入取景框，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元素，“报道框架”通过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分析，来解读《星洲日报》如何“构建”新闻事件。

本文试图借由框架分析回答以下问题：

- (1) 《星洲日报》通过怎样的议题框架来报道中国？
- (2) 《星洲日报》如何报道中国议题？
- (3) 《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的特点？

### 3. 《星洲日报》涉华议题框架分析

议题框架分析从整体层面把握《星洲日报》对中国形象的勾勒。笔者将 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的《星洲日报》进行立意抽样，每月选取一周的报纸作为分析样本。抽样原则是：1.新闻标题含有“中国”者，或者标题没有“中国”二字但内容相关者。2.排除原则：虽然标题有“中国”，但内容的着眼点为亚洲者，排除于样本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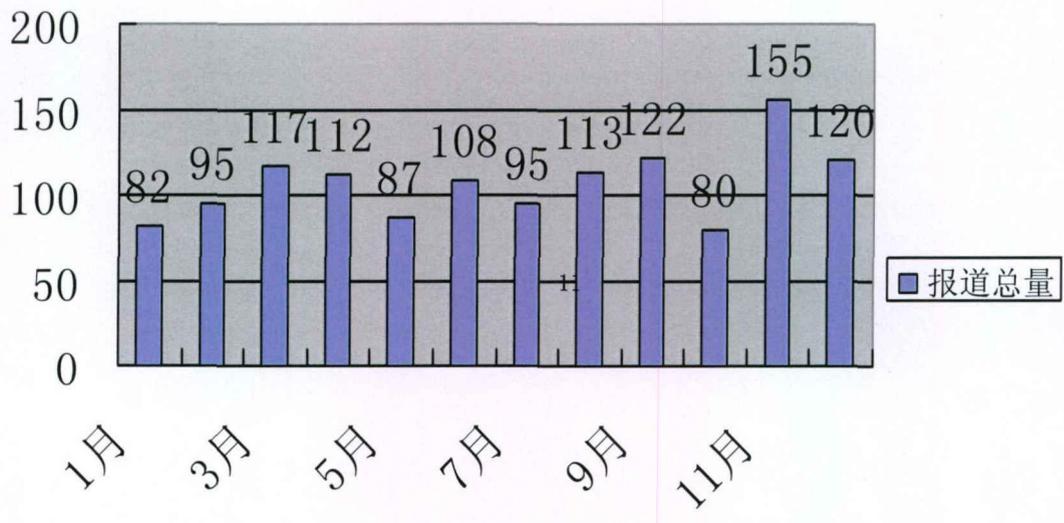
由于《星洲日报》的娱乐报道，关注的重点非本国的娱乐事件，而是整个亚太华人地区，因此 90%的版面都是国人所熟知的两岸三地娱乐明星以及绯闻八卦。当然，由于马来西亚是华人集中居住地，是华人明星“辐射”的重点地区，且当地的娱乐产业不及大中华地区繁荣，娱乐新闻重点关注大中华地区十分容易理解。但是《星洲日报》是一份市场化报纸，娱乐新闻通常以消息类体裁出现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篇幅小、条数多，因此，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笔者认为，单纯以明星的国籍来将华人娱乐圈进行分隔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也无法起到较强的说服作用，故抽样时排除了该部分内容的统计。

本研究全年共抽取了 84 天的样本。所选文本包括消息、评论、解释性报道及图片报道。依据文字内容配发的图片不属于图片报道的范畴。最小的分析单位是“篇”，主要以独立的标题为界定标准，若一个大标题下有几个带有小标题的报道时，再根据电头、记者名字以及文章内容的关联度进行界定。

#### 3.1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总体构建

##### 3.1.1 报道总量分析

由于语言和文化的亲近，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向保持着较高的热忱。《星洲日报》的涉外报道主要集中在“国际”、“综合”、“天下事”几个版块，日出 4 至 10 版不等。这几个版块中，涉华报道占了相当的篇幅。为了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马来西亚媒体及公众的注意，本研究统计了 2009 年《星洲日报》每月的涉华报道总数。见图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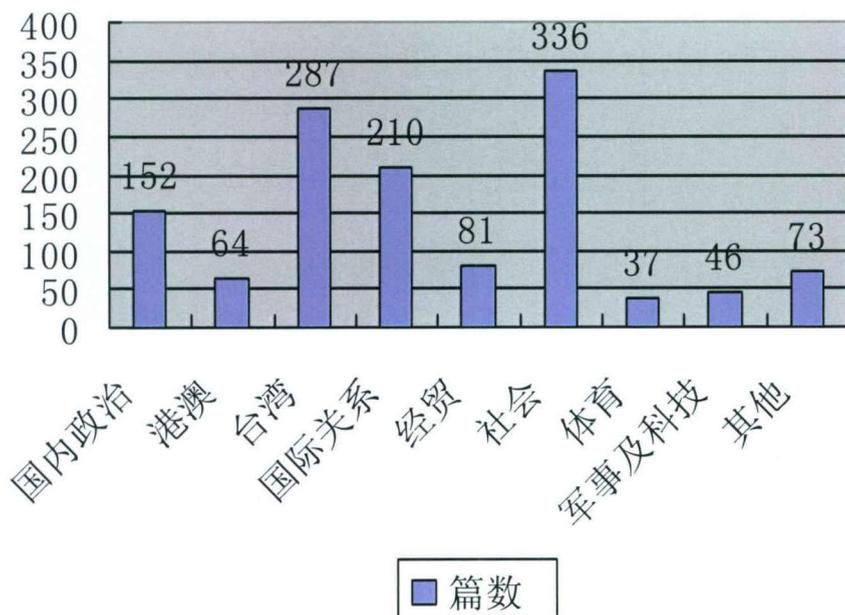
图表三：《星洲日报》涉华报道数量

由图表三可见，《星洲日报》对我国的关注程度较高，84天共抽取样本1286个，涉华报道的数量较为平稳。样本数量最多的时段为11月，155篇，日报道数量达22.2篇；即使在样本数量最少的10月，随机选定的10月5日至10月11日这一周内，涉华报道也达80篇，平均日均报道量为11.43篇，这应该算是很高的比例了。除本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公众不仅频繁且及时地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也能充分认识中国的重要地位。

### 3.1.2 议题框架及分论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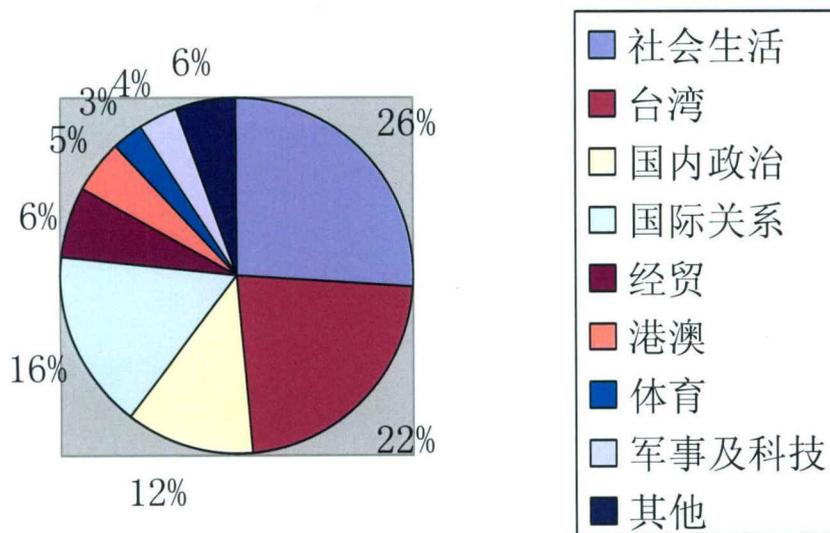
#### 1. 议题总数

《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涵盖了我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不同议题之间，报道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加姆生认为，媒介框架是一种建构的过程，通过阅读全部的文本，笔者发现，《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选择了特定的议题来描述中国，并接受诠释该议题的某些观点。可细分为如下9类：国内政治、港澳、台湾、国际关系、经贸、社会、体育、军事和科技及其他。（见图表四）



图表四：各议题报道总数

由图表四统计可见，社会生活是《星洲日报》最为关心的部分，这一议题以 287 篇文章的数量，成为《星洲日报》构建中国形象最主要的议题框架，在议题中占到 26.3% 的比例（见图表五）。



图表五：《星洲日报》各议题比例图

从历史上看，这一点不难理解。自东南亚各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政府“为了国外华侨的长远利益，便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有利于处理我国和有关国家之间的关系”<sup>[41]</sup>，

主动放弃了双重国籍原则。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认同从政治上效忠于中国转变为效忠于所居住的民族国家。侨居国政府也大都推行了程度不同的同化华人政策，自此，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由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的转变。不管是强制同化还是自然同化，其目的都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或泯灭华人的民族文化特性，使其完全融入当地民族，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的华侨报纸也向华人报纸转向。华文报纸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连结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的纽带，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华人认同当地的障碍，因此，华人报纸多数经历了或严厉或温和的方式“落地生根”。不仅政治认同的嬗变上，编辑方针与内容的变化也出现了改变，这构成了东南亚华文报纸发展变迁的语境。在经历了本地化的变异之后，中华传统文化早已不是早期华侨认同的比较传统的文化原型了。但是，“世界上不同地区华文报业，所处环境不同、经验有异，却血脉相连，命运与共。这不仅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语言背景所带来的认同感，同时也因为今日各地华人社会经济和文化互动日益频

繁，已经形成了“大中华经济网络”以及“大中华文化网络”<sup>[42]</sup>。因此，对于《星洲日报》来说，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可被视为在所在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制约下，其表达和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主动选择。

此外，《星洲日报》非常重视“台湾”议题，岛内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与“港澳”议题相比，台湾议题的报道量是前者的四倍。2009年的抽样显示，“台湾”议题仅排在“社会生活”议题之后，在所有框架中占第二位，共有287条报道，占总报道量的22%。对台海局势、台湾岛内新闻的关注，一方面证明了《星洲日报》作为华人世界和国际舆论中的一个独立媒体，与国内媒体的关注点和出发点不尽相同，海外华文媒体相异性的降低，过去因地域分割而形成的“港台”、“大陆”的概念逐渐淡化，代之而起海外华人的概念，充分说明《星洲日报》构建中国总体形象的框架和总体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同样是马来西亚对外政策的一个缩影。自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当局抛出“南向政策”来向东南亚各国交好，开始积极进行“务实外交”。试图通过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而参与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和其他领域的合作，谋求该地区的政治支持。台湾在新马泰三国都有较长的投资历史，与这三国的关系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因此相比港澳来说，台湾的报道份额要重很多。

与西方媒体侧重点不同的是，《星洲日报》并没有特别突出强化中国的“人权”框架<sup>[43]</sup>，而是转向关注中国的军事、科技议题，这与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战略有着重要的联系。马

来西亚对于中国这一距离最近的强邻所怀有的戒心或许从未消除，无论两国的友好合作如何加深，在对华政策上，马来西亚一直把安全考虑放在第一位，因此，无论对华政策怎样变化，都可以从中发掘出安全问题的影子。

## 2. 议题分论点

在每个议题下，不同领域的报道数量存在较大差异。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同一议题也会彼此进行框架竞争。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星洲日报》的报道框架，本研究把常规议题再次细分，表一呈现的是各类常规议题的分论点。

表一：议题框架以及各框架分论点

议题框架	新闻事件 / 主题	框架论点
社 会	都市题材	大力士徒手拉动巴士；女子跳楼奇迹生还；重庆女子宫外孕，肝脏罕见长胚胎；上海同性恋节不搞游行；男子在公厕粪池捞钱币，年收入颇丰
	天灾人祸	工业污染水源，盐城出现全市大停水；贵州两户七村民被杀；安慰320万人受冰灾；南京50层高楼大火
	人文	西安发现西汉壁画墓；南京梅花节开幕；哈尼族长街宴热闹举行；贵州四棵古树连为一体；
台湾框架	两岸关系	两岸故宫破冰；中国欢迎台湾参加国庆观礼；马英九盼两岸年内签经济协议；两岸关系改善有助中国打击海盗；两岸经贸正常化将扩大
	岛内政治	陈水扁申请停止羁押又被驳回；台立法院蓝绿大乱；陈水扁子女及女婿涉嫌伪证罪；风灾引发台湾政坛地震；陈水扁申请法官回避遭到拒绝
	台湾社会	台狠父丢女入热水锅；新郎不胜酒力，婚宴结束后猝死；台湾灾区超过千人不肯下山；

		男子冥婚娶遇难女友
国内政治框架	政坛变动	中国“两会”聚焦救经济；中国政府否认西藏出现骚乱；中国异见分子投诉遭到监控；中国制定国防动员法，表明国家将根据需要转入战争状态；深圳高层将出现大换班
国际关系框架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马关系等	越战30周年纪念日，中越双方官方在沉默中度过；中国要求美国遣返关塔那摩湾的新疆籍恐怖分子；钓鱼岛不影响中日关系；马来西亚考虑承认中国大学；美国派大使出席中国国庆
港澳框架	龚如心案、H1N1、香港经济	乌鲁木齐被打，港人游行捍卫新闻自由；香港脑死亡女子一命救四命；金融海啸卷走7万香港富翁；澳门开展廉洁选举大步行；香港媒体自我审查加剧
经贸框架	经济繁荣、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	中国连续6月增持美国公债，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6%；中国拟掷5兆刺激经济；中石油海外扩张策略跨大步；中国“闲人经济”目前大行其道；东莞再掀倒闭高潮。
体育	赛事报道、明星绯闻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包揽短道速滑前三名；中国体坛巾帼好酒量；周蜜将在香港安家；刘翔再起飞难救票房，上海田径赛门票惨淡经营
军事及科技	“中国崛起”	中国的国防预算提高14.9%，称不威胁他国；中国下月可能宣布造航母；中国从中央王国走向海上强国；中国开展国家反恐演习；中国军费开支超英赶美
其他		央视直播出状况，主播吐舌抠鼻；异见分子投诉被监控；《环球时报》发行英文版；达赖抨击中国死刑；三名六四人士被拒绝入境香港

进行细分发现,《星洲日报》几乎囊括了所有“大中华”区具有新闻价值的时间。每个议题下,《星洲日报》的关注焦点有所侧重:社会生活中的都市题材、岛内政治争、国际交往中中国与外部大国之间的交往是最常出现的报道题材。

### (1) 都市题材

大陆各类犯罪、灾难报道,以及各类奇闻轶事,在各议题分论点中占据了最多的版面篇幅,且多为负面题材,台湾框架中报道台湾社会的部分也是如此。笔者认为,这一发现体现了《星洲日报》对中国民生及社会基本问题的注重,代表了以《星洲日报》为代表的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新闻的选题存在的矛盾性——既看好中国,又立志于揭露问题和阴暗面。另一方面,在市场化报纸中,受西方媒体惯于关注的社会事故性问题的影响,“猎奇”成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都市题材、奇闻轶事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一类新闻,也较为容易其体现报道的平衡客观,最不为利益所牵制。都市题材反映出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社会形象的基本看法——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明进步表示肯定的同时也及时地反映国内的各种问题,为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提供了新的、也更为广阔的领域。

### (2) 岛内政治

《星洲日报》对台湾岛内的关注,与对大陆的关注,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岛内政治明显集中在政治领域,而且焦点明显集中在负面事件上,可以说,《星洲日报》关注的台湾,实际上是台湾岛内的政治乱象。这一结果表明,《星洲日报》并非对政治回避或不关心,除了趣味性、显著性外,政治性也是其进行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作为国际媒体的政治属性和作为同为华语传播方式的文化渊源双重影响,是构成其报道主题双重特征的深层因素。

### (3) 大国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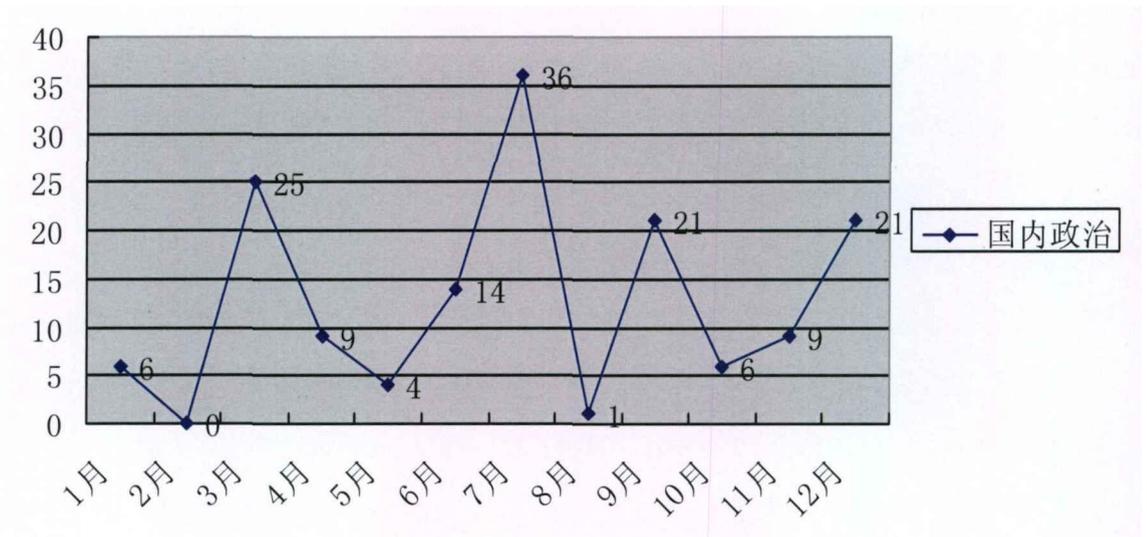
排第三位的是国际关系框架,该部分报道除关心中马关系外,也同样关心中国与外部大国的交往及相互关系。这一点从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上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亚太地区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而且随着这一地区地位不断提升,大国的利益角逐将会愈演愈烈,中美之间的利益碰撞,无疑具有多发性,其影响也往往带有全局性。因此,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力求在中美等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平衡关系,充分突出了《星洲日报》的政治性,也体现出海外华文媒体在沟通中国与海外华人交流中的服务性。

## 3.1.3 议题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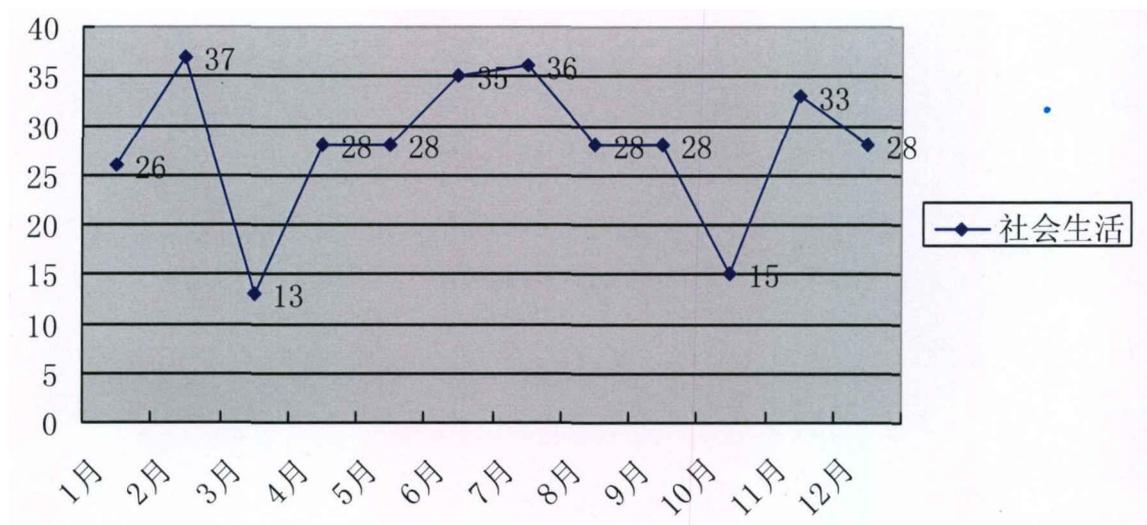
在同一年度的报道中,议题走向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清晰地展示议题在每月涉华报道中所

占比例的走势，反映出日常状态下以及存在框架竞争时各项议题相对其他议题的受关注情况。从而综合得出《星洲日报》给公众带来怎样的中国形象。

根据各议题的走势变化，本研究发现，《星洲日报》议题走向分为三类，一类为周期性变剧烈的议题；一类为周期性变化平缓的议题；一类介于二者之间。根据抽样结果，周期性变化最为剧烈的为国内政治议题（见图表六）、变化最为平缓的议题为社会生活议题（见图表七），港澳议题、经贸议题、台湾议题、国际关系议题、体育议题、军事与科技议题、其他议题的变化均处于两者之间。



图表六：国内政治议题走向表



图表七：社会生活议题走向表

图表六表明，“国内政治”议题在《星洲日报》平时的报道中，报道量偏小，2月甚至没有一篇报道，8月的抽样也只有一个，但有时会随着特定事件的发生而变大，如2009年3月，报道量达到25篇，7月的报道量达到峰值的36篇，皆因为这两个月中，3月是

国内召开“两会”的时间，国内重大政策的确定和调整在此时集中讨论；2009年7月则发生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这个月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报道屡见报端。因此“国内政治”议题呈现出陡峭的曲线图，上升和回落都很剧烈。

图表七则正好相反，“社会生活”议题在报道框架中，一直较为平稳，且数量居高不下，12月中，有5个月的样本数量相等，均为28篇。此外，即使在框架竞争最为激烈的3月，“社会生活”议题依然有13篇报道，平均每日1.86篇；值得说明的是，11月的抽样时间为11月16日至11月22日，此周最重要的议题是奥巴马上任后的首次访华之行，该时段的其他议题几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但“社会生活”议题依然保持了33条的报道量，平均每日4.71条，可以说和奥巴马访华保持着同样强劲的报道势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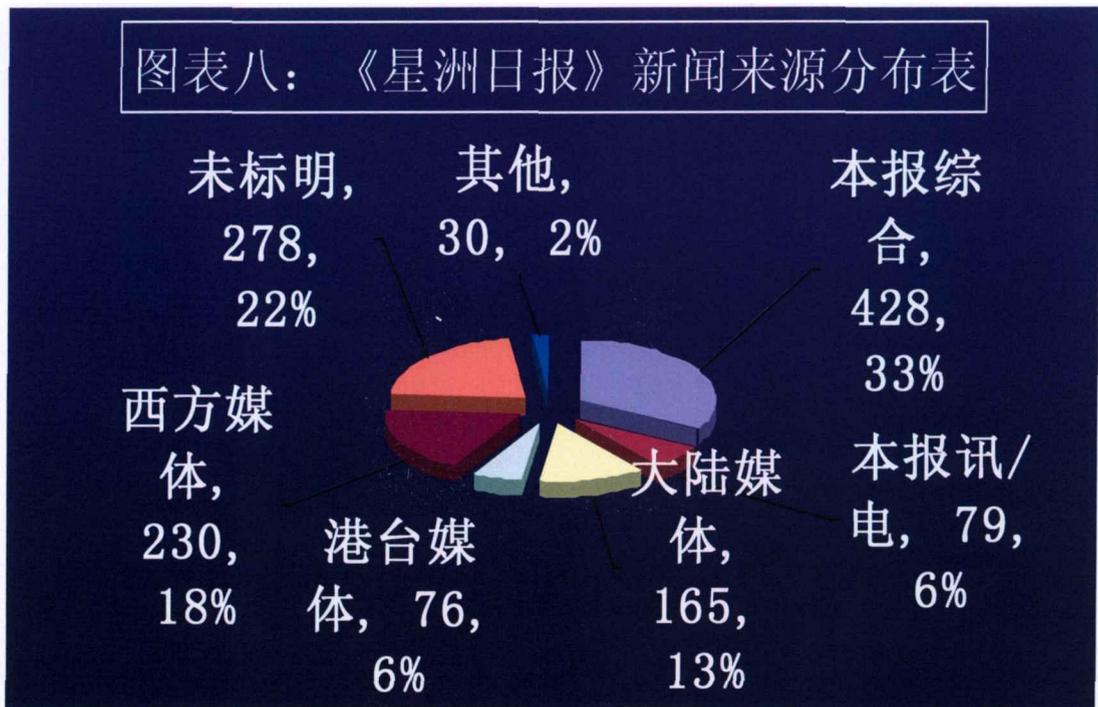
## 3.2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新闻处理分析

### 3.2.1 《星洲日报》新闻稿件来源分析

新闻稿件来源反映出报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及其新闻渠道的沟通，反映出《星洲日报》运用何种视角去看待、分析中国问题，面对来自外部的选择如何取舍。这一指标，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通过对样本媒体《星洲日报》抽样所得总计1286篇涉华报道进行了新闻来源的分类：按新闻稿源的来源分成：“本报讯/电”、“本报综合”、“大陆媒体”、“港台媒体”、“西方媒体”、“未标明”以及“其它”7大类。

“本报讯/电”主要指《星洲日报》自行采集及自行编发的稿件，除“未标明”外，其他四类均属于“转发稿”。其中“大陆媒体”主要包括新华社、中新社、China Daily等国内各大主流报纸；“港台媒体”主要涉及了港台地区的《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央社等媒体以及来自港台媒体的署名评论；“西方媒体”则主要指西方主流的通讯社如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媒体及来自海外的署名评论；“其他”互联网稿件。具体分布见图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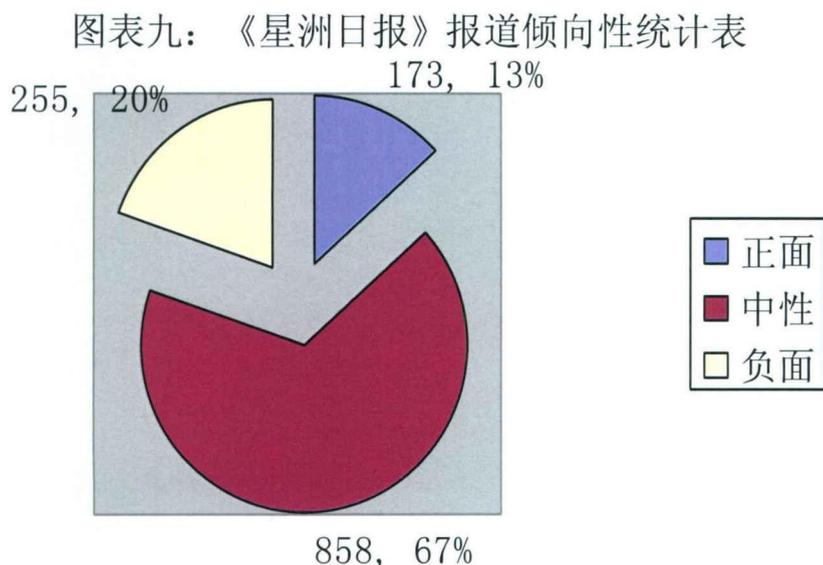
从图表八可看出，本论文抽样的涉华报道中，新闻来源为“本报综合”的涉华报道数量为 428 条，占总数的 33%；其他媒体转发稿中，数量最多的来源为海外媒体，230 条，占 18%；再次为大陆媒体，总数为 165 条；转自港台媒体的稿件数量为 76 条，占总数的 6%；标明“本报讯/电”的报道为 79 条，占总数的 6%。此外，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其中 22% 的稿件，并未标明稿件来源，此部分共有稿件 278 条。

此外，在抽样过程中，笔者总结出几种稿件运用规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新闻常采用“本报综合”的模式，使用国内媒体的图片；国内政治议题通常不采用国内的报纸及通讯社的稿件，转去采用港台媒体或者海外媒体的稿件；涉及两国纠纷或冲突的报道，会选择第三方的稿件以示中立；有时一条新闻中会出现多个稿源；绝大多数的稿件为转发稿。

### 3.2.2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倾向性分析

根据类目制定中对《星洲日报》报道倾向性的设定，本次抽样得到如下数据。见图表 4。本研究将“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三个指标划分为对新闻报道倾向性分析的三个要素，试图解释《星洲日报》在进行涉华报道时的价值判断。笔者对倾向性三个指标的区分不在于事件本身是正面报道或负面报道，而主要是看新闻报道中所使用的词汇或语言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被报道对象的利益和总体形象。若一则新闻的内容中内容或用词无法判断其倾向性，则可列入“中性新闻”中，如果一则新闻的报道引起争论，但报道呈现了各方意见，这样的新闻也会被列入“中性新闻”。此外，笔者认为，“中性报道”也是一种倾向性报道方式，因为在报道某一事件，尤其是具有争议性事件时，保持“中性”

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本身也是一种倾向。



图表九显示出《星洲日报》涉华报道倾向性的总体分布。从数量上看，1286个样本中，中性报道占了《星洲日报》绝大多数的份额，以858条报道的数量达到67%的比例，负面报道的比例比正面报道略重，占总量的20%，正面报道占13%。研究显示，多数报道中，《星洲日报》采用非单一新闻源的方式来凸显其客观性；在表现出自己明显倾向性的报道中，议题的分野十分明显。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繁荣昌盛，《星洲日报》从未吝惜笔墨地赞扬，但对于社会新闻、“天灾人祸”，《星洲日报》又表现出明显的批评态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抨击也是不遗余力。由此可见，《星洲日报》对中国大陆的报道具有双重特征，既有肯定、赞扬、关切的一面，又有揭露、异议、批驳的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报纸所在国政策上平衡新闻报道的考量，也有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抗拒以及其国内民族安全问题上的防范，是多种影响因素合力的结果。

## 4. 《星洲日报》报道框架分析

议题框架从整体上把握了《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本章将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近距离考察新闻文本，考察其如何架构新闻事件的报道框架，研究《星洲日报》的话语模式。

文献综述部分提到，台湾学者臧国仁认为，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框架的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以及低层次结构。高层次结构通常会通过标题、导语等形式表现出来。中层次结构的组成环节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溯因、评价等。而框架的低层次结构则指字、词等具体的语言符号的使用等。

本章以该建议为参考，对新闻文本进行三个层面的话语分析。选取的样本为“兽首事件”的报道。

### 4.1 框架的高层次分析

对于重大的议题，新闻媒体会选择多个相关主题进行连续报道。媒体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均是表明立场与观点的途径，同时，对某主题的反复强化也是凸显其重要性的方法。主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引导性，提出了系统规范报道框架，是框架的最高层次，决定了下级层次的选择与组织。

“兽首事件”在 2009 年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跟踪。2008 年 10 月，佳士得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消息传出后，引发中国民众热议，近百人组成律师团追索。2 月 24 日，法国法院批准拍卖。2 月 26 日，蔡铭超拍得铜像，但称因拍品无法入境而不付款。

《星洲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长达数周的连续报道。笔者选用立意抽样中，3 月随机抽样时间为 3 月 2 日至 3 月 8 日的报道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抽样所得“兽首事件”文本 17 篇，包括新闻报道 5 篇，言论 12 篇。

框架的高层次常常以标题来大致为事件定性，或以标题来突出媒体对核心事件的萃取。这 17 篇报道的标题以及版面分布见表二。

表二：“兽首事件”报道标题及版面分布

3月2日	亚洲华人买鼠兔首？律师团悬红寻铜像 下落	21版 国际
3月2日	当中国人遇上法国人	24版 言路
3月2日	高度政治化的拍卖	25版 言路

3月3日	天价投得鼠兔首，厦门买家拒付钱	19版 国际
3月3日	法国拍卖文物的思考	19版 国际 全球评论
3月3日	兽首青铜器拍卖风波	22版 言路
3月4日	爱国还是骗子？蔡铭超骗拍，中国人反应不一	23版 天下事
3月4日	法国：拍卖兽首不成功，疑中国幕后作梗	23版 天下事
3月4日	回流文物需“大智慧”	23版 国际 全球评论
3月4日	他们还在拍卖祖先的耻辱	26版 言路
3月4日	圆明园的故事	27版 言路
3月4日	爱国者还是骗子	27版 言路
3月5日	鼠兔铜首的有趣发展	27版 言路
3月5日	苏东坡的遗憾	27版 言路
3月5日	蔡铭超好心办坏事	27版 言路
3月7日	蔡铭超标获鼠兔首铜像 中国：和国家无关	28版 国际
3月7日	老鼠，兔子，谁家的？	30版 言路

由表二可见，《星洲日报》标题在“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上，采取了综合各方观点的作法，力求显示其公正和客观。但在具体的层面上观察，该报依然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17篇新闻报题中，按倾向性分析，9篇为中性标题，占总报道量的53%；倾向于支持法国或反对中国的为2篇，占总量的12%；支持中国的报道有6篇，占总量的35%。报道以历史逻辑来强调和凸显文物的归属，多篇报道立足于追溯历史；体裁上，它以大量评论来表明立场；它使用了“回流”、“好心”、“耻辱”等标题来强调它的支持和反对。此外，导语中进行了如下表述：“沸沸扬扬的‘圆明园鼠首兔首拍卖事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厦门艺术品经纪人蔡铭超宣布自己是在拍场上出价的人，但‘不会付款’，以此彰显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法国狡猾的商人，进行了一次古董炒作，出售圆明园2件文物，要把古董市场来一次大提振。2个铜兽像拍卖了2400万欧元（约马币1亿1244万588令吉），这实在是一个逆市而动的天价。”通过对主题和标题的概括和归纳，我们可知，《星洲日报》对于“兽首事件”的主题为：鼠兔首原是属于中国，法国以天价进行拍卖，本身是不道德的。蔡铭超拍下之后不付钱的行为是对是错，还有一

些争议。

此外,《星洲日报》围绕该事件发表大量评论也值得关注。一周的抽样中,评论达到12篇,平均每天为1.71篇,这是很高的比例。该报选用了各种观点的交锋,形成自由讨论公共话题的区域和开放的言论空间。

由此可见,《星洲日报》的高层框架突出了事件的戏剧性因素,并以大量评论来表达自己观点,其构成框架为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多元框架。

## 4.2 框架的中层次分析

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包括了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归因、评估等。在新闻报道中,“主要事件”指事件的核心人物和情节;“先前事件”与“历史”均指社会事件发生之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者、或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但与主要事件有间接关系者的历史。这常常可以引申到整个宏观的社会背景。“结果”与“影响”指由主要事件引起的后果,包括直接的以及间接的后果。“归因”是对事件发生的因果推测。“评估”则指对事件现象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sup>[44]</sup>

以署名评论《天价投得鼠兔首,厦门买家拒付钱》以及《他们还在拍卖祖先的耻辱》为例,来分析《星洲日报》报道框架的中层次结构。

报道一:

### 天价投得鼠兔首,厦门买家拒付钱

(中国·北京)早前在巴黎以天价买走圆明原兽首的神秘买主周一(3月2日)在北京露面。

买主是厦门商人蔡铭超,亦是一名古董收藏家,同时也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收藏顾问及厦门心和艺术中心的总经理。

鼠、兔两兽首铜像,上周三(2月25日)在巴黎的拍卖会上,各以1574万5000欧元(约马币7376万5711令吉)天价成交。

蔡铭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己参与竞拍是出于对于国家的热爱,也是为了不让中国国宝外流,但是不能付钱。

任何中国人都会站出来

他说:“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那个时候都会站出来,只是我赶上了这个机会而已,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款不能付。”

新华社记者询问他是否代表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抢标,蔡铭超答道:“我是代

表所有中国人。

蔡铭超并表示，百年前因为战争因素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都不应该被拍卖。

牛宪峰：能否成交未知数

据《北京日报》报道，蔡铭超原本只是想看一下拍卖状况，没有成交可能性就不参与；但最后不但进入拍卖程式，标价还不断标高，蔡铭超才不得已参与了竞标。

与此同时，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峰则指出，虽然蔡铭超拍下了圆明园兔、鼠首，但由于尚未付款，且目前仍在付款期限内，因此拍卖能否最终成交尚属未知。

佳士得虽不起诉，违约或被判监罚款

英国《泰晤士报》周一报道，尽管竞得圆明园铜兽首的蔡铭超表示不会付款，但佳士得公司‘不可能’起诉他违反合同。

报道指出，佳士得不可能起诉蔡铭超违反合同。按照通常做法，佳士得可能会让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递补而上。

不过，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有法国专家认为，若蔡铭超违约，可能面临法国方面的刑事制裁。根据法国法律，蔡铭超可能面临6个月监禁和2万2500欧元的罚款。

也有人认为，蔡铭超只会受到民事处罚，即巨额的赔偿金。

主要事件：厦门商人蔡铭超现身媒体，表示拍卖是尽国人责任，拒绝为鼠兔首付款。

先前事件：神秘男子在拍卖会上拍走鼠兔首，买家被怀疑是华人。

消息来源：蔡铭超本人、新华社记者、《北京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峰、法国专家。

结果：拍卖能否最终成交尚属未知。

评价：对蔡铭超的行为表示赞同，但表示有可能面临监禁和罚款。

以上的中层次结构分析体现出市场化报纸报道的一些框架特点，将新闻人物的话语作为报道的主要内容、引用多方观点，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突出事件的戏剧性因素。事实上口语反应也是后果范畴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让记者或编辑有机会阐述客观的、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但选择什么人做评论者，引用哪些话，如何安排引用语的顺序却透露了记者编辑的主观意图。口语反应范畴可用时间参与人的名字和身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他们所说的话来进行暗示<sup>[45]</sup>。该报道首先对蔡铭超的观点进行间接引用，继而进行直接引用，自己的出现两处直接引语、两处间接引语，强化了其行为的合理性；此外，该报道选择我国的消息源5处，法国的消息源两处，以及1处未说明的消息源，虽呈现出多样化趋

势，但主体仍在支持我国的立场。

报道二：

### 他们还在拍卖祖先的耻辱

“正当北京圆明园鼠首和兔首拍卖事件引起中国人的抗议与愤慨之际，印度圣雄甘地流落海外的遗物，包括一副写有“让我看到自由的印度”这句甘地名言的眼镜，将于3月5日在纽约公开竞标，也在印度引起了群情激愤的反应。

印度、中国、埃及和巴比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悲哀的是，在人类充满杀戮的战争史上，这四大文明古国的大批文物，都成了战胜者血淋淋的战利品，至今仍流失海外。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罗浮宫和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世界三大博物馆，都收藏了数以万计这四大文明古国被掠夺或盗窃的文物，但它们都拒绝将这些文物归还原属国，理由是：它们来源合法，已成为博物馆乃至所在国财产的一部分；文物原属国没有能力保护文物；文物属于全人类文化和精神遗产，应为全人类享有。

瞧，就是这当今被赞誉为民主典范的三大民主国家，今天仍然公然地以种种美丽的说辞，来合理化他们的祖先所干下的强盗行为。

1861年，法国大文豪雨果在他写给英法赴中国远征军巴特莱上尉的公开信中，曾痛心的批判了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大肆掠劫的行为，他说：“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遗憾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法国人并没有记取雨果所说的“统治者所犯的罪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误”的教诲；更没有如雨果所说，展现“政府有时是强盗，但人民永远不会作强盗”的人性光辉。

悲哉！当年在雨果笔下“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的“强盗”，今天竟还公然地在拍卖人类的文明，也在拍卖他们祖先的耻辱！”

主要事件：法国拍卖鼠兔首，是历史上强盗行为的延伸。

先前事件：继法国拍卖鼠兔首引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慨之后，纽约公开竞拍甘地遗物，也在印度掀起欣然大波。

结果：证明英法公然拍卖人类的文明，是拍卖其祖先的耻辱。

评价：强烈鲜明的讽刺。

通过以上的中层次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市场化报纸的言论框架。透过一个小切口，发表各自的观点。只要言之成理、逻辑成立，均可自由表态。

此外，让我们再开看看《星洲日报》选择了哪些角度和材料来组织报道的主要事件。

通过文本阅读可以发现，对于鼠兔首及历史回溯的报道为 6 篇，如梁文道的评论《圆明园的故事》等；摘取各方观点的片段达到 13 条，包括援引《泰晤士报》、《华尔街日报》、赵启正等人的表述；对蔡铭超的身份猜测占 3 篇，由此可见，《星洲日报》对此事的报道更多的是采用了“人情趣味框架”，即报道的焦点往往放在一些个人的、轶事的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等方面，采用这一框架的报导关心的是普通人的兴趣，通常与政治没有什么关联<sup>[46]</sup>。即使是着眼于官方立场的部分，也是通过一种“闹剧”的方式来呈现。

对历史进行回溯的部分也值得继续深入解读。“历史”表明了新闻事件发生的背景，如果一个事件被抽离出它所发生的历史时空，淡化其历史背景，会导致新闻客观性的淡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对新闻事件的诠释。因此，“历史”有利于呈现新闻的客观性，使新闻文本趋于开放。整组报道以评论方式将与鼠兔首的历史向读者讲述清楚，也加强了读者进行自行判断的空间。

### 4.3 框架的低层次分析

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是指框架通过关键词和基调表现。持有不同立场的媒体在描述事件和表现人物形象时，常会使用某些具有感情色彩和社会心理内涵的词汇。海外华文媒体在报道中国事务时，往往使用一套有别与大陆主流媒体的话语方式体系，本小节笔者将立足于以报道中使用频率较高，含有一定的主题意义的关键词语来对“兽首事件”进行解析。在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中，名词、动词的使用是让报道看起来更具客观性的法则，因此，名词和动词的考量是本小节的主要任务；同时，笔者也会对表明媒体态度和立场的形容词进行考量。

#### 4.3.1 名词

名词是记者用来对事件下定义、贴标签的词汇。记者用“天价”描述蔡铭超拍下鼠兔首的价格、用“责任”来解释蔡铭超的行为；对法国人的称呼是“强盗”，用“耻辱”来为法国拍卖事件定性，把鼠兔首描述成“赃物”。同时，在陈述法方观点时，也直接引用了“幕后作梗”来怀疑中国政府在此事件中的做法。

#### 4.3.2 动词

拍下天价鼠兔首后，蔡铭超“拒绝”付款；在采访中，他称此事为对法国人的一种“回击”，是对国家的“热爱”，华人试图购买鼠兔首，是要将文物“追回”，法国人，是在进行文物“炒作”。此外，在《蔡铭超骗拍，国人反映不一》的报道中，虽然标题用了“骗

拍”二字，但整个文章的基调是将事件定性为“爱国行为”。

#### 4.3.3 形容词

形容词对表达媒体的态度起着直接的作用。用“暧昧”和“毫无益处来形容法国的文物拍卖行为，用“戏剧性”来形容拍卖的峰回路转，在回溯历史时，用“血淋淋的战利品”来形容鼠兔首。

#### 4.4 《星洲日报》涉华报道报道框架特征

综上所述，笔者总结出《星洲日报》涉华报道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特征：

##### 4.4.1 新闻来源趋向多元化

综观《星洲日报》的报道，以唯一新闻源对消息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方式较为少见，一篇新闻稿几乎均融合了多种信息源，经过不同层次的框架，呈现在受众面前。报道通常采用多层次的消息来源和不同背景人物的口语反应，使新闻显得平衡而有说服力，但不同消息来源的排序以及对事件背景选择性的引用，可使受众接受其在政治上的判断与预测。

##### 4.4.2 以独特的话语方式为报道定下基调

独特的话语方式在于“整合”——将各种版本的叙述融合，再发出自己的声音。海外华文媒体最初的信息来源或许和大陆主流媒体是相同的，但这个消息源往往作为由头，通过对事件不同角度的阐释，形成与大陆主流媒体、西方媒体不同的效果。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星洲日报》身处于各种矛盾系统中，它的报道框架、消息来源如何选择，以及受到各方利益的影响。虽然《星洲日报》采用平衡报道手法，尽可能反映各方事实，但从上述对于主题、关键词、信息来源来看，我们看到了“兽首事件”中，一个强大的、主导框架的产生——法国人进行鼠兔首拍卖是不正义、不道德的。

这一结论给了我们另一个启发，虽然如前所述，《星洲日报》对中国问题有批评、有反驳，但当涉及中国在对外交往的活动中时，总体上是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上。当然，这一结果并不能简单地用华文报纸即倾向于中国的答案去解释，虽然作者当中华人占了多数，但要说他们的个人立场均倾向于大陆并不尽然。因此，这种倾向，应被视为《星洲日报》编辑团队选择的结果，代表着马来西亚新闻体制下《星洲日报》的理念和考量。

## 5. 结论和思考

### 5.1 结论

本研究第三章从新闻选择及新闻处理的角度,分析了《星洲日报》涉华报道的总体特征,第四章则通过对重大突发议题的连续报道框架分析,从媒体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话语及基调不同层次角度,阐述了其在对中国新闻事实报道中宏观与微观的概况,可得出如下结论:

《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从多个角度折射出中国的方方面面,反映出马来西亚社会对于中国的看法,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为审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某种参考。《星洲日报》十分重视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报道量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并波动幅度不大。这说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中国有着强烈的了解需求,媒介对中国始终进行重点关注。

从内容上看,《星洲日报》涉华报道几乎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用以构建中国形象的议题框架主要有9个。各类型报道在数量分布上差距十分明显,最多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类的报道,有336篇,占全部报道量的26.2%,而最少的体育类报道45篇,占全部报道量的3.5%。各类内容的报道按数量依次排序为社会生活、台湾、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贸、其他、港澳、军事及科技、体育。此外,构建中国形象的9类议题中,有些议题是只有重要新闻事件发生时才会引起媒体重视的,最呈现这一特点的议题是“国内政治”议题,在常规报道中,这一议题会成为框架竞争的牺牲品;但媒体对“社会生活”以及“台湾”议题保持着居高不下的热情。

《星洲日报》对台湾政局及社会的重视以及对台海关系的重视,均远远超过国内中文媒体,这说明海外华文媒体已成为华人世界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类独立媒体,非“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香港地区性的媒体,也说明海外华文媒体构建了其相对独立的总体形象,及总体的价值判断。

《星洲日报》的涉华报道更倾向于使用“人情趣味框架”而非使用“议题框架”来建构中国的形象。新闻工作者根据对大众口味和兴趣的预期来进行选择报道议题和报道内容。

《星洲日报》对于中国的报道绝大多数是中性的,新闻与评论对中国的倾向性差异很

大，新闻基本平衡，显示了客观、中立的新闻精神，评论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分野。在1282个样本中，有858篇报道，采取平衡报道的方法以显示其客观性，占总报道量的67%。余下的428个报道中，有173个、13%的报道展示出一个“积极的、强大的”的中国，有255个、20%的报道对中国问题呈负面、消极状态的报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议题分化十分明显，经贸议题、“军事与安全”议题中，正面报道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负面报道多数集中在“社会生活”议题的都市题材，以及“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但在涉及两国间争议性的话题及国际关系议题时，《星洲日报》对中国较为支持。

为了显示其客观性，《星洲日报》采用多种信息来源对同一事件进行展示的报道手法。在涉及国际关系的议题时，通常选用第三方的稿件作为平衡。同时，本研究发现，涉及中国的很多重大报道中也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一些报道中，中国学者、专家、商界和民间人士的言论被采纳，中国人的意见更多的被列入了参考的范围。在涉及中国的负面报道时，《星洲日报》多用外稿或约稿的方式，减少了记者发负面稿的机会，但其在报道中国内部事务时，采用的话语方式与国内媒体有很大不同，它坚持以“自己的方式说话”。

就稿件来源上看，“本报综合”所占的比例最大，达到33%，也就是说，《星洲日报》处理新闻稿件的方式，与国内媒体及西方媒体均有一定的差别，它习惯在多种声音的博弈中，呈现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他稿件来源按数量多寡进行排序，依次为西方媒体、大陆媒体、港台媒体、本报讯以及其他。该结果又呈现出两大特点：（1）自采新闻所占份额很小，稿件的原创性不足；（2）并非涉华报道就以中国的稿件作为主要新闻来源。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抽样所得的1286条新闻样本中，有278条新闻没有标明稿件来源，占据了总报道量的22%，该现象值得高度重视。

在报道中，《星洲日报》较少使用主观性强的形容词或副词而改用名词、动词以达到“客观”的效果，使得受众更容易接受其传达的观点和价值。

## 5.2 思考

### 5.2.1 海外华文报刊在塑造中国国际形象上的作用

#### 1. 是国内媒体在国外的延伸

海外华文传媒本是为了加强中国同海外华人的信息沟通而产生，诞生之初的重要作用就是帮助维系海外华人同中国的联络和感情。程曼丽教授认为，海外华文传媒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中国传媒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华人聚居地，也存在于华人所在国的大众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华文媒体的存在是一

种近距离的传播<sup>[47]</sup>。在马来西亚主流文化惯习地以居高临下的方式“俯视”华族，政府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举措使华人融入当地社会，借此同化他们时，华文媒植根当地华人地区，较好地受众出发，刊发符合当地华人需求的信息，给了当地华人很多的支持和保护。

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华文报纸在当地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几乎都选择了一条与当地主流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文报纸既是当地的传媒，也是专门面向华人社会的传声筒，它的言论、办报宗旨对种族和解、社会稳定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华文报纸不仅引导了当地华人社会的舆论，维护了华人群体的知情权，也是一股潜在的、制衡政府的权力，是反映华人诉求的重要力量。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华文报刊的读者群从华侨、华人逐渐扩大到一部分当地人士，是当地人了解中国、学习中文的最佳途径之一。

## 2. 是西方传播流中的平衡力量

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公众舆论》中指出，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情的想象所激发起的情感。人们直接观察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相当有限，通常情况下媒介提供的信息是“想象”的唯一源泉，因此在了解外部世界时，媒介形象作为真实世界在媒介中的反映和呈现，构成了人们认识产生的重要因素。该观点早已在学界达成共识。

在国际关系中，一国形象的好坏，国际新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媒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给予中国事务高度关注的同时，又以跨文化的眼光去对中华文化进行审视和观照，并借助他们强大的传播力，形成“舆论场”，对中国进行“他国想象误读”。

近年来，随着海外华人数量及地位的上升，财富的积累，与主流社会的磨合为海外华文媒体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和话语权。在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扩大汉字在全球的影响，早已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有着地理及心理上接近性，对西方国家形成的舆论场有很好的消解作用，是除中国和西方外，有效的“第三种力量”，对澄清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误解，向西方民众更好地传达中国的真实信息，起着良好的作用。

### 5.2.2 对我国对外传播的启示

虽然本文是研究《星洲日报》的中国形象构建的分析，但它是马来西亚的主流华文报纸，在海外华文传媒领域的作用不可忽视，受到的新闻管制也比较相似，因此我国在对与

《星洲日报》同类的海外华文媒体进行对外传播时，下述启发可以合理地推而广之：

### 1. 继续增强经贸议题的报道。

经贸利益是促使东南亚媒体及海外华文媒体正面报道中国的重要原动力，我国应继续强化合作和利益纽带，积极参加国际经贸体制的建立，做守信用、负责任的大国，同时，正面的中国经济形象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国际参与信用。

### 2. 加强民生新闻的报道，将文化交流转变为真正的民生报道。

对于与国人一脉相承的海外华人来说，中国的形象由“人”来构成，国家形象具体到了人，才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他们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主要在于希望知道中国人的真实状况如何，生活情形如何，这一方面也是我国传递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 3. 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是人权及政治事务的处理上，可努力的空间不大。

国家利益取向是海外华文媒体国际报道倾向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社会高度信息化的走向，更多的政治势力已经深深意识到控制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对于当今的媒体而言，要想保持完全的独立、公正和自由，很难做到。

## 5.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 5.3.1. 本研究的不足

由于时间、人力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仅选择了《星洲日报》，而未能将其它报纸马来西亚纳入其中，也不能呈现同类报纸在涉华报道中的异同，实属遗憾。另外本研究未能将电子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内容纳入其中，所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报纸，无法推论至其它大众媒体。

在类目建构上，本研究仍有许多的缺陷。由于所有的抽样均由本人独自完成，受视野及水平所限，类目建构时的互斥与穷尽原则相对某些篇目来说还值得商榷。

此外，本研究只考察了生产者如何选择和建构框架，而未能将受众的反应和认知纳入考察范围，无法揭示更为深层的意义。

### 5.3.2 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星洲日报》自创办至今已行过 80 余年的风风雨雨，本研究只掀开了其中的小小一角。如有可能，可将其不同时期的涉华报道作对比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考虑深度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方式，或进行受众调查，以便于更好地揭示更深层的社会及文化含义。

同时，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是一个未曾穷尽的课题。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把媒体范围扩

大至广播、电视、网络及新媒体等,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视角。

## 注释

- [1] 方汉奇:海外华文新闻史——未曾穷尽的研究课题[J].国际新闻界.1998:2
- [2]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
- [3] 马来西亚华文传媒发展综述.2009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年鉴出版社出版:84
- [4]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纸话语权比较研究[J].东南亚研究:2008,3:72
- [5]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纸话语权比较研究[J].东南亚研究:2008,3:72
- [6] 世界华文传媒年鉴2009.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81页
- [7] 彭伟步.新马华文报纸话语权比较研究.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三期:73
- [8] 同上
- [9] 崔贵强.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M].南洋学会华裔馆,2002年版:285
- [10] 马来西亚华文传媒发展综述.2009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中国新闻社,世界华文年鉴出版社出版:441页
- [11]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
- [12]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新加坡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2003
- [13]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
- [14] 杨力.海外华文报业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 [15] 吴庆棠.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 [16]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 [17]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18] 彭伟步.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 [19] 彭伟步.海外华文传媒概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 [20] 王士谷.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Z].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 [21] 吴潮.我国对海外华文报刊的研究.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 [22] 印度尼西亚华文报业步履维艰地复苏.世界华文传媒年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3年版:第215至219页

- [23] 袁丁. 印尼华文报刊的复苏, 八桂侨刊, 2000 年第 4 期
- [24] 黄昆章. 印尼华人新闻业的现状与前景, 暨南学报, 2001 年第 4 期
- [25] 李普曼. 公众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12
- [26]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Pl.
- [27] 邱林川. 多重现实: 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和争辩,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2 第一期
- [28] Pan • Z and Kosicki G.M.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3, 10: 55-75
- [29] 董天策、徐宁: 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6 期: 232-235
- [30] 臧国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M], 台北三民书局, 1999 年初版: 28
- [31] Frame Analysis: A Primer, www.lboro.ac.uk
- [32] R • M • Entman.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1(4): 6-27
- [33] D'Angelo, Paul: News Framing as a Multi-paradigmatic Research Program: A Response to Entm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2, 52(4): 830
- [34] 臧国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三民书局, 1999 年版, 第 32 至 44 页。
- [35] 布雷恩 • S • 布鲁克斯等. 新闻报道与写作[M] . 新华出版社, 2007: 4-7
- [36] 王石番: 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 台北: 幼狮文化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第 135 至 139 页:
- [37] 孙五三: 新闻学论集 (第 12 集), 1992
- [38] 王怡红: 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J], 1993 年第 4 期
- [39] 杨瑞明: 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 新闻研究资料第 60 辑
- [40] 刘伯红等: 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J], 1997 年第 1 期
- [41] 彭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人民日报. .1980 年 9 月 14 日
- [42] 郭振羽: 展望 21 世纪世界华文报业. 中央日报. 1993 年 12 月 9 日

- [43] 谭梦玲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媒体如何构建中国形象》的抽样显示,“人权”议题是美国构建中国形象最主要的框架。
- [44] 转引自董天策、徐宁. 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年第6期: 232
- [45] 托伊恩·A·梵迪克(Teun·A·Van Dijk)著, 曾庆香译, 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 2003年。
- [46] 李艳红. 政治新闻的模糊表述: 从中国大陆两家报纸对克林顿访华的报导看市场化的影响[J]. 台湾: 新闻学研究, 75期
- [47] 程曼丽. 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思考. 国际新闻界. 2001年第3期: 25-30

## 参考文献

## 专著

- [1] 王慷鼎. 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95).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 1995年8月
- [2] 艾尔·巴比著, 邱泽奇译. 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 华夏出版社, 2005
- [3] 彭伟步. 东南亚华文报纸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7月
- [4] 彭伟步. 星洲日报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5月
- [5] 王士谷. 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 新华出版社, 1998
- [6] 程曼丽. 海外华文传媒研究. 新华出版社, 2001
- [7] 冯应谦. 全球化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机遇.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年5月
- [8] 赵振祥. 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1月
- [9] 陈乔之. 冷战后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 [10] 曹云华, 唐翀. 新中国——东盟关系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4月
- [11] 盖伊·塔奇曼. 做新闻, 华夏出版社, 2008年8月
- [12] 梵·迪克著, 曾庆香译. 作为话语的新闻, 华夏出版社, 2003年版
- [13] 辛格里特利.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 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
- [14] 刘继南. 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 [15] 唐维敏等译. 文化、社会与媒体: 批判性观点. 台北远流出版社
- [16] 锺蔚文. 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 台北正中出版社, 1992
- [17] 格雷姆·伯顿(著)、史安斌(主译). 媒体与社会.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 [18] 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 传播的偏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 [19] 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 社会研究方法(第10版). 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 [20] 郑超然、程曼丽、王泰云. 外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21] 海外华文传媒年鉴, 中国新闻出版社, 2009年
- [22] 臧国仁. 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 三民书局, 1999年版
- [23] 外交部政策研究司编. 中国外交·2009年[M]. 北京: 极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 [24] 李希光, 孙静惟. 全球新传播——来自清华园的思想交锋.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年

- [25] 钟蔚文. 新闻报道与真实建构: 新闻框架理论的观点. 传播研究集刊(第三集), 1998年
- [26] Hongshan Li, Zhaohui Hong. Image, Perception, and the Making of U . S . ——China Rela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 期刊论文

- [1] 方汉奇. 海外华文新闻史——未曾穷尽的研究课题, 国际新闻界[J], 1998 第2期
- [2] 董天策、徐宁. 从“连战访问大陆”看市场化报纸的时政报道——香港《东方日报》与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框架的比较分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J], 2005 年第6期
- [3] 张克旭、臧海群、韩纲、何群. 从媒介现实到受众现实——从框架理论看电视报道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 新闻与传播研究[J], 1999 年第2期
- [4] 彭伟步. 从中国妇女受辱案看马来西亚华文报纸的历史责任. 东南亚研究[J], 2006 年第3期
- [5] 彭伟步. 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文化传播与编辑特色. 国际新闻界[J], 2001 年第5期
- [6] 彭伟步. 新马华文报纸话语权比较研究. 东南亚研究[J], 2008 年第3期
- [7] 张洪忠. 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 2001 年第10期
- [8] 叶江. 试析大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关系. 世界经济与政治[J], 2005 年第2期
- [9] 刘小燕. 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 国际新闻界[J], 2002 年第2期
- [10] 罗以澄、夏倩芳. 他国形象误读: 在多维视野中观察. 新闻与传播研究[J], 2002 年第4期
- [11] 刘丰、田春燕. 用框架理论分析媒体导向——以“9. 11”事件后美国主要媒体的报道为例.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5 年第六期
- [12] 周聿峨、陈雷. 东南亚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 东南亚纵横[J], 2004. 06
- [13] 董青岭. 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当议. 国际政治研究[J], 2006. 03
- [14] 王士谷. 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 国际新闻界[J], 2000
- [15] 裴永刚. 海外华文传媒态势分析. 当代传播[J], 2005 (2)

### 学位论文

- [1] 谭梦玲. 美国媒体如何构建中国形象.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年

- [2] 毕笑楠. 香港英文媒体如何塑造大陆形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年
- [3] 刘虎. 国家利益与媒体国际报道: 以《联合早报》中美关系报道为例的分析 (1999-2006).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年

#### 报纸资料

- [1] 《星洲日报》2009 年相关文本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1] 董天策、翁倩. 从北京奥运报道看晚报体育报道的优势和不足. 青年记者[J], 2008 年 11 月
- [2] 翁倩. 浅论报刊审读与媒介批评之异同. 新闻爱好者(理论版)[J], 2009 年第 6 期
- [3] 翁倩、王乔峰. 也谈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的关系. 今传媒(学术版)[J], 2009 年第 4 期
- [4] 王乔峰、翁倩. 再论绝症病人的知情同意权. “构建中国生命伦理学与深化卫生改革”中国医学伦理学论文集. 西安交通大学, 2009 年

## 后记

我在暨南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三年。此刻，随着毕业论文的收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于我即将告一段落，心里饱含不舍。

我曾经那么期待来到这里。三年前，终于第一次踏进这所学校，推开 725 的房门，我不可抑制地爱上通透的落地窗和烈日下怒放的紫荆；第一堂课，董老师给我们讲述学习理论的意义，那句“无用之用，才是大用”醍醐灌顶；第一次同门聚会，董老师语重心长，“希望你们都成为有用的人。”

我在这三年收获、成长、改变。逐梦的时光是快乐的，暨大的包容、多元让我开始真正思考自己是谁、在哪里、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惭愧未能在学术上交出自己满意的答卷，但这三年，我没有虚度。三年来读过的书、受过的训练、接触的人、经过的事、磨砺出的工作习惯和待人处世的方法，会在将来的每一天延续，也大抵不会改了。

说回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董天策教授，论文从构思、立论及其后的历次修改，董老师都严格把关、及时扶正，花费了大量精力。董老师，您的谆谆教诲，我将始终铭记！

论文写作的过程或许是艰苦的，写作后期由于开始在工作单位试用，我不得不在广深两地来回奔波，无数次独自在周末图书馆的密集书库长时间抽样，再搭周日的晚班车离开。现在想来却不以为苦，这些细节已经成为温暖和充实的存在。

感谢远在家乡的父母，你们不计付出、竭尽全力的爱和支持，是我面对世界最大的勇气。

感谢男友王乔峰对我论文写作的启发和帮助，你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奇迹。

感谢宣传部刘老师和凌老师，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老师。

感谢 725 的柳远、刘含玉对我的包容和照顾，我们一起成长三年，所有的分享和分担，都在心里。

谢谢图书馆工作人员为我查找资料提供优质服务。

因为真正努力过，所以一切都那么正式和珍重。希望所有同学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翁倩

二零一零年四月·暨南园